

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赵树理评论的兴衰

程光炜

【提要】“赵树理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所独有的现象。本文先是梳理这一提法的来龙去脉,继而触及赵树理忠于农村现实的小说与早先建构的评价系统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最后提出它的深层症结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成规难以兼容而造成的。本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回溯了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分析线索亦带有重新反思的意味。

【关键词】赵树理方向 评价的起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063-06

说起赵树理评论的兴衰,这是因为他是一个与195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兴与衰”都有紧密联系的重要小说家。代表着“当代文学方向”的赵树理,其命运的起伏波动,反映了重构“当代文学”历史道路的矛盾和曲折。因此,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还关涉到“当代”能否“战胜现代”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

一、“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是一个以解放区作家身份进入当代中国的著名小说家。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父亲赵和清是农村能人和上党梆子演出能手。赵树理在山西第四师范念书时对五四新文学感到失望,发誓要写“地摊文学”。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他1937年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当过烽火剧团团长、《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编辑等。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刚发表时没什么反

响,直至受到彭德怀和周扬重视后,它们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传播开来,被评价为反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代表性作品。

周扬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并没有提出“赵树理方向”,而是一年后陈荒煤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联“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时正式提出来。因周扬位高权重,最后才被确认是他提出来的一个口号。^①因为全国还没解放,陈荒煤也很谦虚,他在文章中强调说:“当然,方向不是模型,向赵树理同志学习,走赵树理方向,绝不会限制了文艺创作更进一步的自由发展,限制文艺创作的形式多样性。”他乐观地估计:“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创造了一种新形式,这新形式也仍会继续发展,更趋完美。”这种谦虚还因为赵树理是他在边区管理范围内的作家。他没想到解放后,赵树理成为了“全国性”的作家。直到解放后,在中宣部分管文艺工作的

^① 根据陈荒煤此次发言整理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发表在1947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胡乔木把赵树理借调到中南海任干事，希望他成为新中国的高尔基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才真正被树立起来。胡乔木不写小说批评，他对赵树理的器重中却包含着明显的批评意味：“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他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让赵树理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尽心读书。^①另外，“解放区批评圈”确定“方向”性作家的时候，不仅注意他政治正确、艺术水平的高超，同时很重视其为人处世上的能力。“周扬是最早肯定他创作价值和历史地位的‘伯乐’，他俩虽说同在华北解放区，却一直无缘谋面，所以会晤时特别愉快。周扬目光锐利、思想敏捷，他对赵树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②赵树理对周扬这位欣赏、提携自己的大批评家，至死一直都是信任的：“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女儿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③

在“赵树理方向”树立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杂音和不同的看法。1950年2月，一位名叫竹可羽的批评家在一篇题为《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的文章里，对“赵树理方向”的提法提出了保留意见。^④他强调：“我们说‘学习赵树理’，这是对的，赵树理把完全中国式的丰富的特别是积极的农民形象和农民语言带进了文艺创作，把读者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一致的重要原则，给了创作界以很好的启发，

作者的对于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坚信和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艰苦的工作，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所有这些，都是文艺界应该虚心和真诚地加紧学习起来的。但是，要使这种学习，环绕着创作，更具体更有效起来，就必须有一种工作同时进行，这就是全面地把赵树理的创作提高到理论上来，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说明，确定赵树理创作各种特色的应有的意义和前进的道路。否则笼统地说‘学习赵树理’固然不很好，仅仅条目式地列出赵树理的创作特色，也不见得会有很大效果。”这等于对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条目式地列出赵树理的创作特色”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甚至有点对立的味道。他的担心，也许与胡乔木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认为赵树理小说的“理论境界”还不够高。但这位作者又自我矛盾地说出了另一种意见：“同时，我想，一个已被大家所确认的成功的作家，该并不希望被当作偶像来看待，因为这对作者和读者都没有好处。如果自己有缺点，被当作优点去学习起来，也是要不好过的。为了加强学习某一作者的效果，具体地指出缺点和缺点的意义来，和具体地指出优点和优点的意义来，该是文艺批评应有的任务。”“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一直希望有人来整个地谈谈赵树理的创作”。临末，他用一种暗含挖苦的口气说：“我之研究赵树理的创作，也无非是个人为了真正想‘学习赵树理’罢了。”这可能并非一篇意气用事的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预示着“赵树理方向”在未来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①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② 《赵树理传》，第255、256页。

③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工人日报》1980年9月22日。周扬这段回忆，表明批评家与小说家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关系，也有个人情谊，由此反映出“解放区批评圈”在涉及私人关系领域方面“温情”的一面。

④ 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二、赵树理评价的起伏

在1950~1970年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从来都是与社会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评价的动荡起伏，不一定是作家作品本身造成的，它的动荡来自社会时事方面，却客观上影响到文学评价标准前后反复和不确定的状态。

有学者认为“赵树理评价”有1946年、1959年、1962年和1964年这几个时间点。^①1946年，抗战后的中国革命转向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阶段，这种情况下，赵树理这位解放区文坛新人的意义便极大地凸现出来。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之后，茅盾、郭沫若、邵荃麟、葛琴和林默涵等也纷纷撰文肯定了他的小说创作。这种“好评如潮期”，一直持续到1959年。茅盾认为《李有才板话》说明赵树理是以“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写此题材的；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是地道的农民，“不是穿着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书中人物的对话口语和动作也是农民型的；另外，“快板”这种小说表现形式也非常独特而活泼。他指出：“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②1946年到1959年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肯定性评价之所以占据上风，是与这个阶段文艺界内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相一致的。作为从农村变革的角度，折射出中国革命道路的必胜心和乐观态度的赵树理的小说来说，这种积极评价显示了革命对自身成就的评价。赵树理也不负众望，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后又掀起了他个人创作的另一个“新高潮”。它是由《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群星灿烂的作品来体现的。连不在解放区批评圈、艺术口味一向苛刻严厉的傅雷也不禁欣赏地说：“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任何读者一上手就放不下，觉得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一部小说没有惊险的故事，没有紧张的场面，居然能这样地引人入胜，自不能不归功

于作者的艺术手腕。唯有具备了这种引人入胜的魔力，文艺作品才能完成它的政治使命，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因而是很深刻地，接受书中的教育。”^③傅雷使用“魔力”这个词，说明他已不把赵树理小说看作“通俗作品”，而认为即使放在五四以来大多数纯文学作品中，也是卓然不群的见解。

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催生了社会上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种急躁地要把中国社会迅速推进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小说批评的眼光，开始对赵树理忠实于生活原貌而这种原貌又与社会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的小说作品，流露出了烦躁和不满的情绪。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署名武养的作者写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④文章虽指名批评《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等于全面否定了赵树理这一时期所有的创作。作者“反对这篇作品”的意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写的大多数都是像“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第二是这个社的主要领导人王聚海、王镇海、杨小四，都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作

① 刘再复、楼肇明、刘士杰：《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浮沉》，《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

② 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另外几篇文章是：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1946年第49期；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原题为《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1947年第10期；荃麟、葛琴：《〈李家庄的变迁〉的分析》，《文学作品选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6月沪版；默涵：《从阿Q到福贵》，《小说》第5期第1卷。

③ 傅雷：《谈〈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文艺月报》1956年7月号。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肯定小说的思想意义，而是从它“情节处理上的特色”入手，通过细读作品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这种意义的价值。

④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在1950~1960年代，《文艺报》经常会以“读者来信”或“笔名”的名义，曲折地表达对某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严厉批评。例如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化名为“李定中”而实际为冯雪峰的那篇批评文章。这位“武养”究竟是一个“笔名”，还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是“文学家”的纯粹的读者，还有待做历史考证。

品描写中，却反成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第三是小说作者的爱憎虽然是很分明的，然而态度是错误的，错就错在他对几个干部“惯用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的群众路线的作风”给予了“支持”和“同情”，认为尽管“有点开玩笑，可是也解决了问题”等等；第四是农业社的整风，“在作者的笔下又走了样”，采取的是和稀泥的含混的态度。所以，作者一开篇就说道，读了《锻炼锻炼》这种所谓“真实”却违反“真实性”的作品，不由得“热血涌上心来，久久不能平静”。对武养这种用“阶级矛盾”来代替小说要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王西彦和唐弢为赵树理进行了委婉辩护。在对小说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之后，王西彦明确表示了对这种“赵树理风格”的理解：“对一篇作品，读者的实际感受和作者的主观意图可能有距离，甚至适相反对。而且，不同的读者，看法也不同，正如我在一开始时所说的，撇开文学修养上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对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熟悉程度不同，尤其是理解程度不同。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就《锻炼锻炼》所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论，赵树理同志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是远较我们深刻的，至少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评论作品时，应该采取一种谨慎严肃的态度。我们要力戒轻率和粗暴。我们太习惯于使用‘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现象吗’……之类的诘问……”。^①

1959年到1962年，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兼敏感期。政策的反复动荡，在这几年是穿插着进行而且变化无常的。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就处在这种被动性的历史情境之中。人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出现的分歧，实际是反映了在如何评价农村合作化运动上的分歧和异见。而在小说批评上的聚焦点，就是赵树理的小说。“武养风波”后，随着调整“大跃进”激进政策种种举措的深入，“赵树理形象”又回摆至“好评如潮期”。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在肯定赵树理塑造农村变革过程中农民形象的成功经验时说：“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

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的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人物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次会上，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②这等于是为他平了反。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出《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小说创造了“潘永福式的人物”。他用一种反驳的语气指出：“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是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些评价不足似的，我认为这主要是对他作品中思想和艺术分量的扎实性估计不充分。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③但1964年风云突变，在《文艺报》第8、9期合刊发表“《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后，批评赵树理小说的文章接踵而来。它们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达到了高潮。魏天祥的《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一文中说：“赵树理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然而在周扬一伙的吹嘘和标榜之下，赵树理的创作简直‘代表了当代文艺的方向’，‘代表了当代文艺的胜利’。”^④山西省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小组著文批判赵树理说：“在《三里湾》的第一页，赵树理迫不及待地叫嚷，村里的地主、汉奸刘老五被‘政府捉住枪毙了’，地主、富农被消灭了，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经过二十多天

①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唐弢文章《人物描写上的焦点》，则发表在《人民文学》1959年第8期上。

②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③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④ 魏天祥：《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年1月8日。

的扩社……统统‘转变’的‘转变’，‘革命’的‘革命’，都成了合作社里的人，并攀亲结缘，成为‘一势’了。”他们坚持说，这是在“疯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根本否定阶级斗争”。^①

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

赵树理评论的起伏和兴衰，在更深层次上是他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原则的复杂关系造成的。以关注农民的命运为己任，是贯穿赵树理参加革命前后始终不变的相当朴素的思想线索。他认为中国革命使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成为了可能。“中国农民的婚姻恋爱是赵树理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首先在《小二黑结婚》中告诉人们，唯有共产党，民主政府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登记》正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续篇”。^②他在《传家宝》《锻炼锻炼》和《邪不压正》中也批评中老年农民身上的“落后性”，但对这些“中间人物”总是抱着温情的态度。关键是赵树理解放后现实心境的变化，他发现“合作化”、“大跃进”运动损害农民的作为与他的创作初衷背道而驰，这使他非常苦恼。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笔下的“新人物”在作品中的比重日益减少，而“中间人物”形象愈加凸显，同情很快向后者大幅倾斜。所以，正像批评家们所看到的那样，到了长篇小说《三里湾》，赵树理似乎越来越不关心笔下主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对那些脚踏实地的乡村实干家和朴实农民反而愈加倾心。也就是说，尽管他是文艺大众化的积极实践者，但他的“问题小说”与五四主题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有较多相通之处，与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却是不怎么一致的。

解放后，最早将上世纪30年代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是1952年12月12日胡乔木在对北京文艺工作者和在京的全国文协组织的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所作的“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报告。他号召：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和高度反

映伟大的现实，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③紧接着，周扬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④前苏联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有以下规定：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其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再次，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最后，是关于“题材”、“典型问题”等具体要求。由于有上述极其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从以上批评文章中，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赵树理虽然积极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斗争和发展，但笔下出现最多的仍然是“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情的农村妇女”形象，是那些老式农民原始状态的生活特点。于是，大家就在继续把他作为“榜样”来推崇的同时，对他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另外，在中国1950至197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文艺界内部在鉴别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上也各持己见，争议不断。1960年代初，当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思潮开始退潮，“赵树理的‘价值’被提倡人物多样化和‘现实主义深化’者所重新发掘”。反之，亦是如此，赵树理的价值又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被否定。^⑤

有人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实际是对当代小说家提出的“纯化”要求。这种思想的不断“提纯”，是将“批判性超越”作

① 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小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山西日报》1970年10月7日。

② 《赵树理传》，第267页。

③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18页。

④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修订版），第88~90页。洪子诚用“赵树理评价史”来隐喻当时文学批评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而他认为，这是左翼文学参与到当代小说创作之中而很容易导致的。

为一种历史助力来实现的。洪子诚把它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它的批判精神；第二是在批判精神之上所表现的一种精神创造意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设计者总是要竭力超越‘旧现实主义’，超越‘批判现实主义’，其实，批判性，对现状的质疑，是左翼文学的生命力的根本点”。^①在评论《邪不压正》这篇小说时，竹可羽就对它的思想内容提出了“纯化”的要求：“赵树理说：他拿一个故事和人物当一条‘绳子’来用，‘这种办法，没有多见别人用过……以后也没有准备再用’。其实，在一个作品中，用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串连起作者要表现的所有的题材，这是一般的创作方法，而且还是文艺创作的特色。你不用这个故事这个人物，你就得用另一个故事，另一个人物；你用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不够的时候，你就不妨多用几个，这就是用个别典型来概括全般现实的方法。”而他认为，赵树理这种用个别来概括全部现实的方法，是违反了倾力揭示“最本质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问题”原则的。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在善于描写人”，“因为人，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个故事，事件，或问题的主题”，“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没有普遍被重视起来”。^②出于一种“批判性超越”的思维，魏天祥在一篇文章中指责道：“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落后人物满天飞，并且写得活灵活现、‘得心应

手’，对个人主义者竭力美化；而对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则竭力丑化。他笔下的‘先进人物’，根本看不出今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只能看到落后、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对群众粗暴等等旧时代的烙印。赵树理对‘旧人旧事’和‘新人新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立场。因此他主张平列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开杂货铺’。这实质上就是反对文艺工作者着意地去熟悉新人新事、突出地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连篇累牍地去写‘旧人旧事’。”他最后说：“翻翻赵树理近几年的作品，他是在变本加厉地实践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③这种结论，当然经不起任何历史的推敲，还不到十年时间，它就变成了一个笑话，继而烟销灰灭。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65 页。

② 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5 日。

③ 魏天祥：《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 年 1 月 8 日。

The Rise and Fall of Criticism on Zhao Shuli and His Works

Cheng Guangwei

Abstract: “Zhao Shuli criteria” is definitely a unique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aper sorts out clues of this concept,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Zhao’s realist novel sportraying rural China and the early criticism on them, and proposes that the deep reasons may be the strong tension between his works and the conventional rules of “socialist re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flects on related literary clues for analysis.

Keywords: “Zhao Shuli crit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criticism; socialist realism

程光炜教授简介

程光炜，男，1956年12月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文学评议组组长，本学科核心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一届评委，“唐弢青年学术奖”评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规划项目和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通讯评委或评委。1998年，担任韩国韩瑞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一年。2010年和2014年先后两次在澳门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曾多次赴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并作为挪威驻华大使馆长期特邀学者参加该国的“宪法日”（国庆节）活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合办过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00年出版之后，已重印十版，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是国内几十所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本科生教材或研究生参考书，同时也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多所大学列为教材，并在台湾地区重新出版。



1992年破格评为教授。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奖”，2008年获“宝钢优秀教学奖”。2010年被评为“北京名师”，获北京市“先进师德个人奖”。2010年被评为二级教授。

程光炜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争鸣》等全国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数十篇论文在《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杂志上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13部，代表著作有《艾青传》（199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年，主编）、《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年）、《文化的转轨》（2004年）、《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2005年）、《文学史研究的兴起》（2009年）、《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2009年）、《当代文学的“历史化”》（2011年）和《文学史二十讲》（2016年）。另外，主编本专业大型学术丛书多种。受邀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项目，其中第一辑和第二辑已经出版。

程光炜教授为国内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线和重要学者之一。2005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博士生开设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讨论课，经过几年努力，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正在成为国内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同行，也纷纷在本校开设内容相同的博士生讨论课。最近几年，他和博士生为讨论课先后撰写了一百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多次获奖，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拓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评价道：“近年来，北大的洪子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把当代文学研究推进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使之开始成为一门值得关注的独立的学科。”

（左 杨）